

第二章 研究前的理解與文獻回顧

一、遺址研究史回顧

(一) 日治時期 (1896-1945)

台南縣位處西南平原地帶，就台灣而言，其遺址記錄時間雖早，但考古調查研究工作的起始時間較晚，根據目前已知的紀錄，最早始於日治初期烏居龍藏曾經在「新營郡新營庄附近」發現陶器（東京帝國大學 1928，鹿野忠雄 1930），森丑之助也在 1902 年報導了他在鹽水港廳發現的「曾文溪」遺址（森丑之助 1902：89）¹，不過都屬於簡單的條目式報導，並未詳細說明發現的內容與地點，這和當時研究者從事的研究方向以及區域具有密切關連（劉益昌 1993：89），當時與考古相關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從事原住民調查的人類學者，在工作的過程中記錄發現的考古遺址，因此也大多未進行詳細的研究工作。

本縣考古遺址的重要發現與日治時期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有關，大正 12 年（1923）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氏計畫開鑿興建嘉南大圳，進行施工工程時，佐山融吉報導於番子田驛（今隆田車站）東北側約 4 公里處，發現有烏山頭遺跡，遺址範圍相當廣泛、遺物也頗為豐富。當時所見之文化層約當出現於地表下 2 公尺左右，出土遺物包括紅色薄形陶器、紅色及黑色陶環、陶紡輪、滑車形耳飾、磨製石斧、石刀、石鏃與骨鏃（矛形器？）、角器等（佐山融吉 1923：130，鹿野忠雄 1930，甲野勇 1939，陳邦雄 1998a、1998b：194），由於本遺址屬於較大型且文化遺物包含層豐富的遺址，當時引起極大的注意，和北部的圓山遺址，中部的水底寮遺址並稱為台灣三大遺址（宮原敦 1926：217）。可惜公共工程結束之後，雖有學者持續報導，但並未進行進一步調查研究，戰後逐漸埋沒了本遺址之所在，直到 1979-80 年才有進一步的調查與記錄（黃士強、劉益昌 1980）。

1933 年秋季來到台南從事教職的國分直一先生，是台南平原地區遺址發

¹ 本研究史著重本計畫調查區域旁及與調查區域相關的台南市、台南縣、曾文溪以南區域。著重由於當時鹽水港廳所包含的面積，幾乎就是今日的台南縣曾文溪以北區域以及嘉義縣的南側部份平原地區，因此難以確認此一遺址所在位置，惟其所用之遺址名稱為曾文溪，未來當進一步考證森丑之助在當時之活動範圍與路線。

掘與研究的重要關鍵人物，他從 1930 年代末期開始，進入考古遺址調查研究的領域，首先在高雄州發現重要的大湖遺址與小崗山遺址，並與台南、高雄的中學教師們共同進行調查，迅速累積南部平原地區的調查資料。1940 年首先和任職於台南第二中學的金子壽衛男，共同發表台南台地周邊區域的史前遺址，指出在此之前發現的台南郵局、新營庄、烏山頭、曾文溪等四處遺址之外，另有 17 處史前遺址（國分直一、金子壽衛男 1940：555-557）。隨後國分先生又發表在高雄、台南境內記錄的 56 處新發現史前遺址，其中在今台南縣市境內的遺址共有 35 處，包括知名的牛稠子、蔦松等遺址（國分直一 1941：48-50），發現者除了國分與金子二位老師之外，還包括高雄中學的老師荻原直哉、翁長林正，以及他們教授的學生們。

就本計畫調查範圍而言，1940 年國分直一、金子壽衛男首先公布白坂勝於當時曾文郡官田庄番子田的國母山遺址，以及金子壽衛男於新營郡後壁庄上茄苳的上茄苳遺址（國分直一、金子壽衛男 1940：557），1941 年國分直一又記錄楊雲德於曾文郡大內庄調查發現的大內遺址，以及國分先生在新營郡白河庄發現的白河遺址，這四個遺址均出土赤褐色素面陶，其中大內遺址另出土有貝印紋陶器、番子田遺址出土有櫛目紋陶器、上茄苳遺址出土有黑色色素面陶，這四個遺址中白河、大內未發現石器，其餘二處出土石斧、石鑿、石刀等石器（國分直一 1941：183、193），顯示當屬於二個不同時代的堆積。1942 年國分先生曾經指出麻豆人胡丙申捐贈給台南歷史博物館的巴圖型石器，是出自於水堀頭，後來也有許多學者請胡先生帶路實地勘察，但卻未發現陶器或石器，不過國分先生也指出在麻豆附近的農田耕地中，的確有小型的巴圖型石器出土，而為台南的劉清井所收藏（國分直一 1942：107-108，林懷卿譯 1980：100-101）。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階段雖然在最後時期由國分直一先生等人從台南台地出發，大量發現南部平原地區的考古遺址，不過本計畫所在區域記錄的遺址並不多，共計包括新營庄、曾文溪、烏山頭、上茄苳、番子田（國母山²）、白河、麻豆、水堀頭、大內等九個遺址，遺址之分布區域於本計畫調查範圍內大多集中於近東側丘陵地的邊緣（表 1），不過早期發現的新營庄和曾文溪二處遺址以及出土石器的麻豆、水堀頭，當在沖積平原之上。

² 根據國分直一、金子壽衛男 1940 年發表的〈臺南台地に於ける先史遺跡に就いて第一報--臺南西南周縁部にける遺跡及遺物〉的記載，顯示番子田即為國母山，且當時先命名為「國母山遺跡」，因此雖在 1941 年國分直一的論文中，將此一遺址稱為「番子田遺跡」，但仍宜稱為國母山遺址，以避免造成混淆。因此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計畫台南縣未建檔遺址中之番子田遺址（臧振華等 1994：1199-2），當與國母山遺址為同一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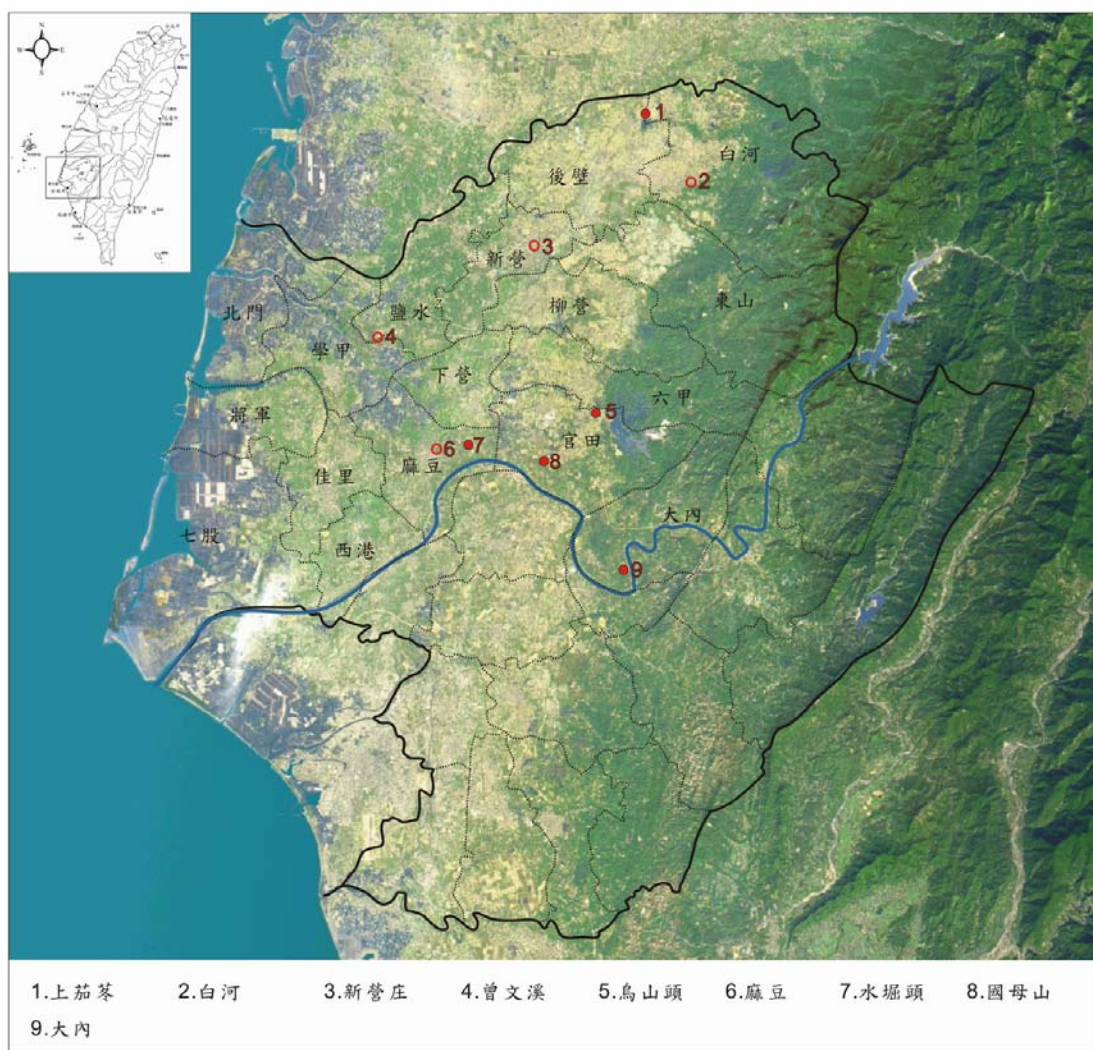


圖 3：本計畫調查範圍日治時期發現之遺址（●確切遺址位置，○遺址位置不明確）

表 1：本計畫範圍日治時期考古遺址調查研究史

年 代	調查研究工作
1902	烏居龍藏曾經在「新營郡新營庄附近」發現陶器。
1902	森丑之助在鹽水港廳發現「曾文溪」遺址。
1923	嘉南大圳工程施工發現烏山頭遺址，佐山融吉報導。
1939	甲野勇調查烏山頭遺址。
1940	金子壽衛男發現上茄苳遺址。 白坂勝發現國母山遺址。
1941	國分直一調查番子田遺址（此即為國母山遺址）。 楊雲德發現大內遺址。 國分直一在新營郡白河庄發現白河遺址。
1941	國分直一記錄麻豆、水堀頭遺址。
1943	國分直一調查國母山遺址。

（二）戰後前期（1946-1970）

戰後從 1945 年底一直到 1970 年代，為本計畫調查範圍內考古學調查研究工作長期停滯的階段，同樣的情形也見於台灣其他地區，最初階段僅有少量調查研究工作進行，1949 年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成立之後，經由考古學田野調查工作，開始在台灣各地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最初由石璋如先生授課，在 1960 年前後由宋文薰先生接手，直到 1970 年本期結束，都未曾針對台南縣境進行田野調查發掘的實習課程（劉益昌 2005），1964-5 年由耶魯大學張光直先生與台灣大學宋文薰先生合力進行的「台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畫」，雖然在討論過程中檢討台南縣境部分考古遺址，但並未針對台南縣境考古遺址進行田野工作，因此台南縣學術的考古研究工作，可說呈現停頓的狀態。在本次調查區域僅有的學術研究工作，是由戰後初期留任在台的國分直一先生完成，1954 年和金關丈夫先生合寫日治末期關於台灣史前考古學的研究工作，提到有關曾文溪上游頭社、玉井的調查工作，說明 1947 年在玉井、楠西之間道路東側，從玉井方向大約 1200 公尺左右的地點，記錄新的遺址，此一遺址是鳴頭部落的鄭水深先生發現的，也記錄國母山遺址的資料，同時記錄了 1947 年國分先生 8 月間，在台南台地東側邊緣台南往關廟的道路通過附近北側，清風莊（台南市結核療養所）發現新遺址，遺址內容和六甲頂、大湖遺址相同，都有良質的黑陶片，且帶有波浪狀櫛紋（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54：73-74、1979）。1959 年的研究指出 1947 年 7 月國分直一在烏山頭遺址嘉南大圳水圳側壁發現伸展形式埋葬的人骨，並歸納本遺址之出土遺物包括黑色粗質陶器、赤褐色陶器、良質黑陶、良質紅陶、磨製打製的石刀、石鋤、石鏃、石環等石器（國分直一 1959：28）。同時記錄國母山遺址出土遺物包括黑色與赤褐色陶器打製石鏃、犁形石器，以及少量帶釉陶瓷（國分直一 1959：27-28）除了調查遺址以外，也在 1949 年圖示了台南縣重要的遺址，包括六甲頂、善化、烏山頭、番子田（即國母山）、佳里、麻豆、上茄苳等多處遺址（國分直一 1949：41-43）。根據國分先生的紀錄烏山頭、國母山與上茄苳遺址均出土有橄欖石玄武岩石器，其中上茄苳遺址尚伴隨出土繩紋陶器與赤褐色素面陶器（國分直一 1940：115），可能屬於繩紋紅陶階段，也就是今日所稱的牛稠子文化。

雖然學術的調查發掘等研究工作停頓，但民間學者與文獻學者並未停止對在地的調查與記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資料蒐集與實地調查工作，是由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的同仁所完成，編纂組長吳新榮先生在《南瀛文獻》第一卷

到第十二卷，總共撰述從 1952 年 12 月 6 日到 1966 年 7 月 26 日之間的十六篇「採訪記」，其中記錄了不少出土遺址的地點，包括後壁鄉菁寮發現石劍，在白河鎮畚箕湖有石器出土，永康鄉六甲頂歷史初期窯蹟，仁德鄉出土古時的甕硿，永康鄉洲子尾天后宮出土史前陶器，佳里鎮廣安宮附近發現貝塚，也在七股鄉篤加發現番子塹貝塚，官田鄉隆田出土冠頭石斧，這些資料最後由張良澤教授輯成吳新榮先生全集的第五集《震瀛採訪記》（吳新榮 1981）。

上述文獻資料採集過程中，勘察的遺物標本或出土地點，僅有番子塹遺址描述較為詳細，此一遺址為 1963 年左右於佳里鎮西郊因建設煉瓦場時發現有陶器，隨後江家錦先生也於番子塹發現貝塚遺跡，因此 1963 年包括吳新榮先生、會同台南市文獻會莊松林、江家錦、連景初三位委員，前往進行調查發現紅陶破片及陶環破片，以及獸齒、貝類，確認貝塚層有二台尺左右，並指出遺址存在當為過去台江浮覆以前海岸線的所在（吳新榮 1962、1981：252-253）。之後劉益昌也於 1989 年循文獻紀錄前往調查，確認遺址所在位置（劉益昌 1989），1994 年由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共同進行的《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二年）—台南縣、台南市》亦再次前往進行調查（臧振華等 1994：1115-FTW）。番子塹遺址出土的文化遺物，包括吳新榮等人於 1962 年採集的赤陶壺、陶環、獸齒與角、貝殼等（吳新榮 1962：87），但並未確認其文化內涵與歸屬，直到 1989 年劉益昌根據其採集的遺物如紅褐色夾砂陶與泥質陶、黑色泥質陶、動物長骨與貝殼等器物與生態遺物特徵，指出本遺址之文化歸屬應為蔦松文化（劉益昌 1989：37-38）。

在本階段末期，考古工作出現較重要的轉變，從 1930 年代同時從事台灣考古工作的國分直一先生，在戰後留任期間，除在台灣大學從事史前史教學，傳授日治時期考古發現與史前文化體系之外，也接續進行調查撰述已如前述。1949 年 8 月返回日本之後，仍然以過去蒐羅所得的考古資料，從事台灣考古研究工作，陸續發表論述，除調查資料外，1960 年前後，在有關台灣史前時代石刀、貝塚的研究論述中，均提及台南縣境內的考古遺址，其中石刀包括今日後壁鄉上茄苳遺址、玉井鄉坑口遺址、官田鄉國母山遺址、官田鄉烏山頭遺址、永康市「永康丘地遺址」、永康市六甲頂遺址、仁德鄉十三甲遺址、仁德鄉牛稠子遺址、台南市三本木遺址，詳細描述並測繪各遺址出土石刀（國分直一 1959、1981），提供重要的訊息。有關貝塚則記錄了蔦松貝塚、三崁店南方貝塚、六甲頂貝塚、三本木高地貝塚、台南市郵便局附近貝塚、芭蕉腳貝塚、鞍子貝塚、牛稠子遺址與貝塚、十三甲貝塚、台南市東

門町農事試驗場東方遺跡、網寮貝塚、中州貝塚³，詳述各貝塚的位置，並指出貝塚出土的貝類（國分直一 1962：60-65、1981），這些資料提供學術界對於台灣西南沿海地區以及全台灣貝塚的全面性資料。基於對台灣考古的研究，國分先生透過學生劉茂源以及熟識的左鎮地區地方文獻採集者陳春木先生，再度於 1960 年代回到台灣，從事實際的田野工作，除了前往蘭嶼以及曾文溪上游進行原住民調查之外（陳春木 1970，安溪游地、平川敬治編 2006：302），1968 年 8 月也曾在玉井進行小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由於國分先生具有外國人身份，不符合在台灣進行考古發掘的條件，因此 1969 年由劉茂源先生接受歷史博物館委任，從事國母山遺址發掘，其目的主要為研究嘉南平原史前文化，探討黑陶文化的來源與演變過程，闡明大陸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劉茂源 1971，陸泰龍 2006），國母山遺址發掘採取探溝式發掘，「探溝總長 22 公尺，寬 2 公尺；然實際上此一探溝是由 AI、AII、BIII、BIV，四個 4 公尺長 2 公尺寬的探坑，依序排列，彼此間隔 2 公尺所構成。」（陸泰龍 2006：86）此次發掘經歷 12 天，出土豐富的文化遺物，「此一遺址最主要的特徵，為其出土豐富的黑陶，及有不同文化層次的重疊。最下層，即第 5 層……。覆蓋其上的第 4 層為黑陶層……。在上一層是第 3 層……，為出自紅褐色素面陶及灰色素面陶文化層」（劉茂源 1971：13）清楚指出本遺址為多文化層遺址，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不過這些標本存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尚未進行更全面性的整理與發表，殊為可惜。

大抵而言，這個階段發現確切的遺址雖然只有少數，但已有許多遺物出土地點的可能訊息，而且遺址分布區域已從日治時期的丘陵邊緣，延伸至沖積平原西側的低地平原，有關烏山頭或國母山遺址的研究，著眼於黑陶，和 1940 年前後金關、國分二位先生倡議的黑陶文化與亞洲大陸東部龍山時期黑陶文化關係的研究，具有密切關連。除此之外，此一階段透過林朝棨教授有關西南部貝塚的研究，指出台南縣市境內多處貝塚，詳細說明貝塚位置及出土貝類，進一步提出貝塚與海岸線變遷、地層變動的關連（1960），是台灣少有的史前時代古地理研究論述。隨後宋文薰、張光直先生透過「台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畫」的研究，建立台灣南部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宋文薰 1965，Chang *et al.* 1969），得以逐步喚起學界對於本區域考古遺址的關注。

³ 中州貝塚即今之中洲遺址，位於台南縣仁德鄉中洲村東北方五百公尺依仁國小附近，屬於牛稠子文化的遺址。國分先生文中將此一遺址列於二層行溪以南（國分直一 1962：65），當為位置誤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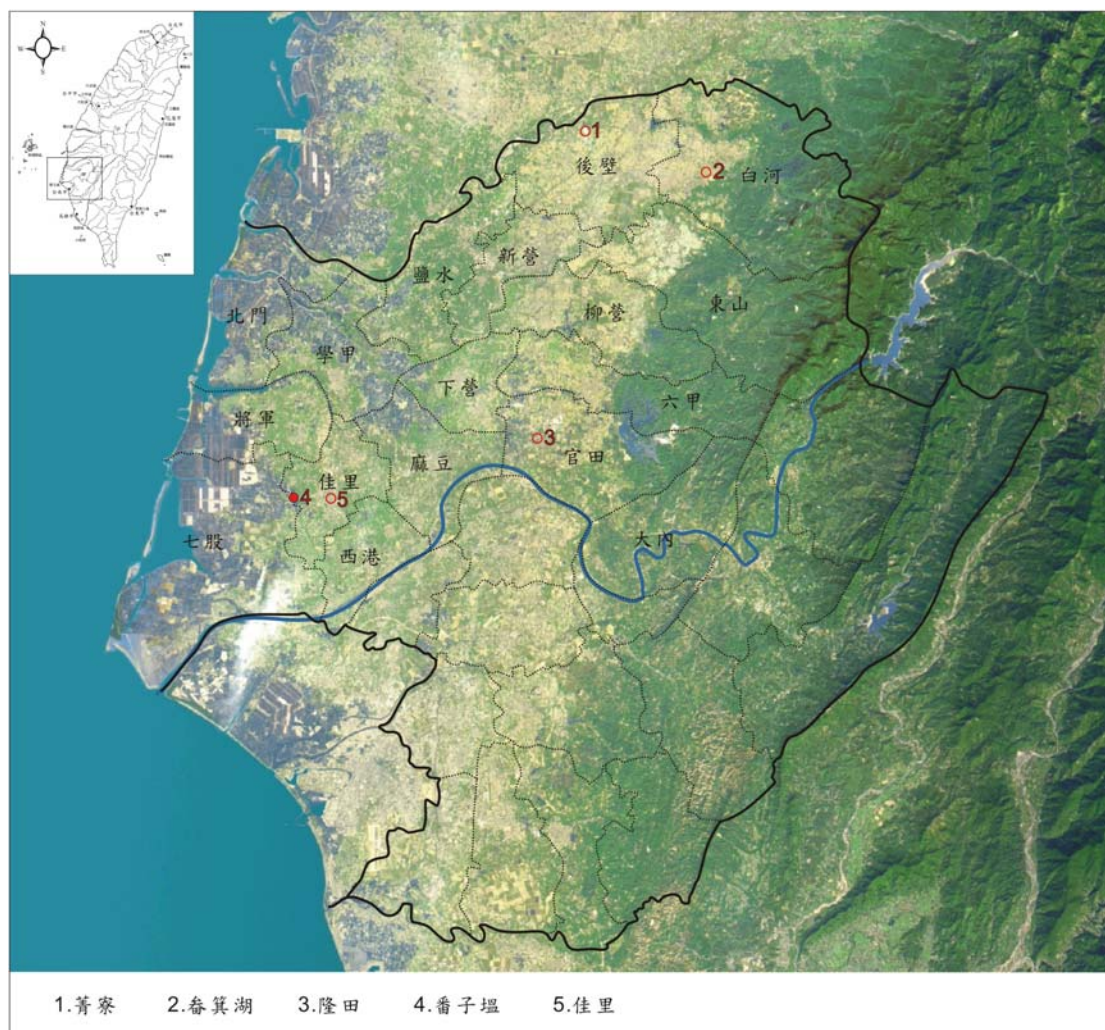


圖 4：本計畫調查範圍戰後前期發現之遺址（●確切遺址位置，○遺址位置不明確）

表 2：本計畫範圍戰後前期考古遺址調查研究史

年代	調查研究工作
1947	2 月國分直一於玉井、楠西之間道路東側，從玉井方向大約 1200 公尺左右的地點，記錄新的遺址。 7 月國分直一於烏山頭遺址水圳側壁發現伸展形式埋葬的人骨。 8 月國分直一在台南台地東側邊緣台南往關廟的道路通過附近北側，清風莊（台南市結核療養所）發現新遺址。
1953	10 月 12 日吳新榮等記錄白河鎮番箕湖有石器出土，後壁鄉菁寮發現石劍。
1959	9 月 27 日佳里鎮廣安宮附近發現貝塚。
1962	江家錦發現番子壠遺址。
1963	1 月 3 日吳新榮等人調查番子壠遺址。
1965	2 月 14 日吳新榮記錄官田鄉隆田出土冠頭石斧，並敘述麻豆出土巴圖石器。
1966	7 月 17 日吳新榮記錄將軍鄉發現可能是荷蘭時期的古砲。
1968	8 月國分直一調查玉井、頭社等地，並在玉井試掘一處遺址。
1969	8 月 28~9 月 8 日國立歷史博物館劉茂源等試掘國母山遺址。

（三）戰後中期（1971-1990）

1972-74 年由耶魯大學、台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合作進行大規模的科際合作計畫－「台灣省濁水、大肚兩河流域自然與人文史料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倡議人地關係的文化生態學研究，就考古學而言，進入生態考古學研究的重大轉變階段，但研究區域侷限於中部地區，並不及於南部地區。同一時間台南縣境除黃士強教授調查歸仁鄉八甲遺址，確認為重要的大坵坑文化遺址之外（黃士強 1974），未有其他調查工作。本區域的調查工作到了 1970 年代中期之後，除了臧振華先生於 1977 年 4 月，於丘陵地與淺山地區調查發現的白河水庫、匏子園、吉貝要、東原、烏山頭水庫、玉井橋等六個遺址，並試掘匏子園遺址，不過並未發表正式報告，直到 1994 年才因普查計畫將這些資料正式披露（臧振華等 1994：1103-PHSK、1103-PTY、1106-CPS、1106-TY、1110-WSTSK、1123-YCC）⁴，歷年來僅由台灣大學人類學系考古田野實習課程，進行台南縣境內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主要在溪南地區發掘牛稠子遺址與蔦松遺址，其他調查研究工作較不及於溪北地區，僅有 1979-80 年進行的「全省重要史蹟勘察與整修建議－考古遺址與舊社部分」計畫，調查已知的遺址，由於 1979 年烏山頭水庫歲修，水庫水位降低至庫底，因此得以在烏山頭水庫內發現相當數量之新遺址，但並未詳細報導（黃士強、劉益昌 1980）。雖然此段期間，學術界對於台南縣境內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不熱絡，但民間的採集者卻蓬勃發展，這些採集者主要傳承自 1930 年代金子壽衛男在台南二中所教授的學生或再傳弟子，其中尤其以蘇木樹先生、郭德鈴先生以及自修古生物學的潘常武先生最為重要，不過這些採集者往往也在不經意的狀況之下，破壞了遺物原始出土的脈絡（劉益昌 1981）。採集所得的重要標本，部分在台南歷史文物陳列館展覽，並由宋文薰、連照美二位教授撰述展示說明文字，基本建構了以台南為中心的史前文化發展體系（宋文薰、連照美 1980），這也是宋文薰教授在 1980 年建構整體台灣史前文化發展體系的重要部分。

此一階段經由 1960 年代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引入台灣，以及台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畫、濁大計畫的研究成果，促使學者重新思考台灣的史前文化體系，建立南部地區從左鎮人、大坵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到蔦松文化等發展階段，不過這些資料大抵依賴台南台地以及鳳山台地周邊遺址為中

⁴ 就計畫主持人劉益昌所知，烏山頭水庫遺址為 1979-80 年間調查發現，玉井橋遺址則首見於 1993 年東西向快速道路北門玉井線史蹟調查報告（劉益昌 1993）。

心的研究，其絕對年代範圍也較為寬鬆，因此未能進行進一步細緻的文化變遷研究，各遺址所進行的發掘工作，也只在探坑試掘的階段，少能進行聚落型態等需要大規模發掘的研究。

本計畫研究區域在丘陵地帶發現的白河水庫、匏子園、吉貝要、東原、烏山頭水庫、玉井橋等遺址中，調查者除了根據其出土遺物與先前認知的蔦松文化進行比較之外，並且提出異於蔦松文化主要的蔦松類型，且具有地方期相代表特徵的東原類型（臧振華等 1994）。由於這個階段調查的遺址略比先前發現的遺址海拔要較高，再加上出土遺物類型特徵的差異，也因此凸顯蔦松文化的區域化特徵，並提示未來進行本研究區域內沖積平原至丘陵地、淺山地區考古學文化特徵時，需關注的差異性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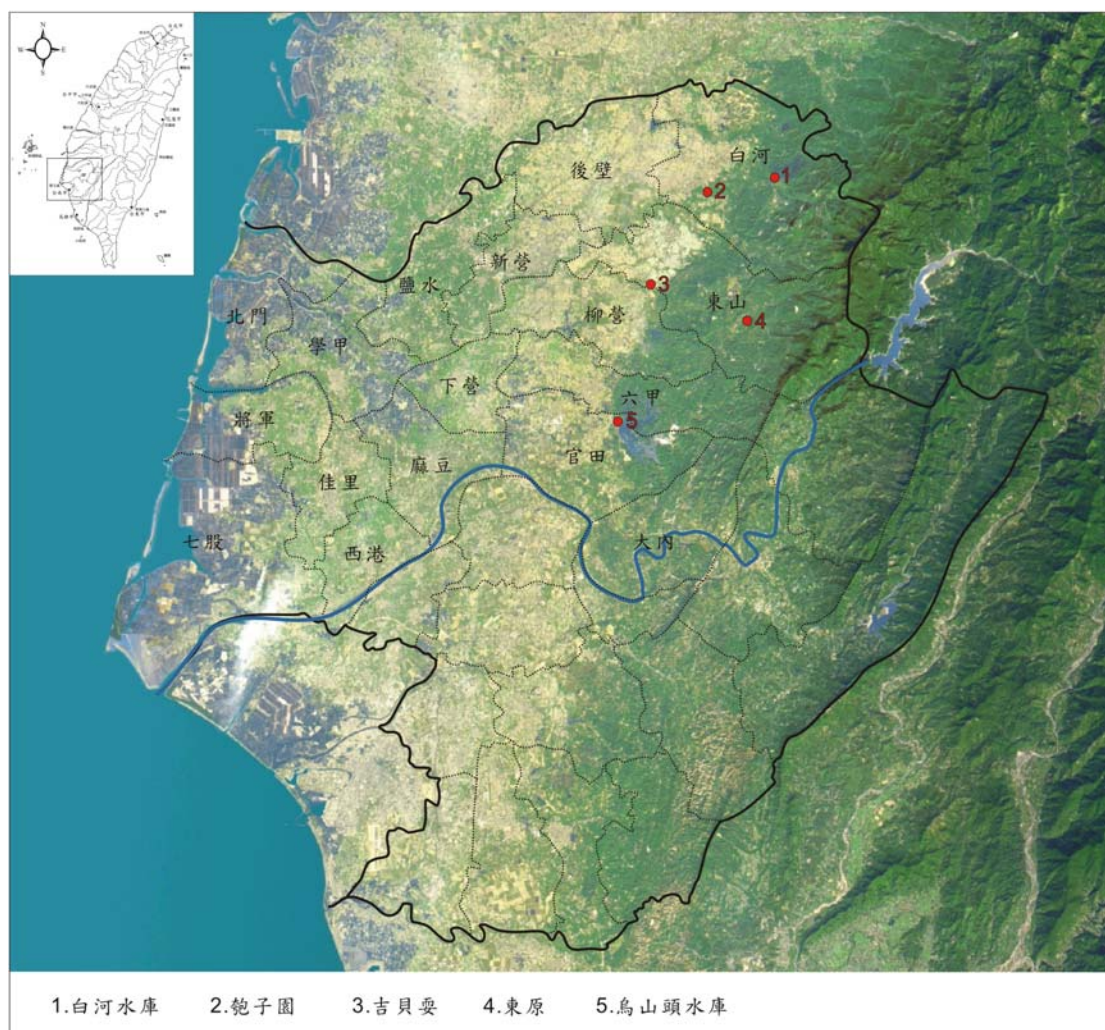


圖 5：本計畫調查範圍戰後中期發現之遺址（●表遺址位置）

表 3：本計畫範圍戰後中期考古遺址調查研究史

年代	調查研究工作
1977	臧振華調查發現吉貝寮遺址、烏山頭水庫遺址。 4 月發現白河水庫遺址、匏子園遺址、東原遺址。 4 月調查大內遺址。 5 月試掘匏子園遺址。
1979	劉益昌、郭東輝調查發現烏山頭水庫遺址，調查烏山頭遺址，發現大型魚塢剝出文化層，重新確認烏山頭遺址所在。
1980	黃士強、劉益昌調查烏山頭、烏山頭水庫、國母山遺址等。
1989	劉益昌等人調查番子塢遺址。

（四）戰後後期（1991-2005）

1990 年前後由於十三行遺址大規模搶救工作引起的「十三行事件」，促使台灣社會意識考古遺址的重要性，加上 1980 年代以來的本土意識崛起，政府與學界終將面對一個新的局面。本區域的遺址調查工作，因為周遭陸續有一些大型工程計畫施工而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調查工作，而有了較大的突破。這些遺址調查研究計畫包括 1992 年進行《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規劃路線沿線文化遺址調查評估計畫》時調查發現的橋頭、凹子腳、鳳梨山等遺址（臧振華等 1993），以及《東西向快速道路玉井—北門線文化遺址調查評估計畫》發現的西寮、二重溪與內寮等遺址（劉益昌等 1993）。內政部於 1992 年起亦開始陸續進行全台各地的考古遺址普查工作（宋文薰等 1992，黃士強等 1993），並於 1994 年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台南縣、市的遺址普查調查計畫（臧振華等 1994），這個計畫除了登錄日治時期以來發現的 18 處遺址外，並於本計畫調查區域發現隆田車站遺址，但卻備註說明因為無法確認本遺址與番子田遺址是否屬於同一遺址，因此暫列為新遺址（臧振華等 1994：1110-LTCC）⁵。

大抵而言，本階段的調查工作大致上是跟隨大型公共工程的開展而起，也開啓工程考古的先聲；再加上公部門有鑑於公共工程與考古遺址介面問題的考量，在學者的促起之下也陸續展開考古遺址普查工作，從而建立未來進行遺址逐年建檔的基礎。就台南縣而言，此一階段最重要的搶救考古發掘，當為溪南地區的台南科學園區從 1995 年開始，一連串的環評與搶救考古發掘（臧振華 2004，臧振華等 2006），截至目前周邊區域仍然在進行大規模的搶救發掘（臧振華等 2007）。

⁵ 前註已經說明日治時期所謂的番子田遺址即為國母山遺址，因此本遺址當為新發現遺址。

在本計畫調查的溪北地區，也出現相同的調查研究型態，烏山頭遺址受到第二高速公路興建的影響，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與鑽探調查評估（臧振華等 1993、1996），確認對本遺址造成重大影響，因此在 1997 年開始進行大規模搶救發掘工作，總共發掘 500 平方公尺，但並未全面完成道路損害部分的搶救發掘工作（李坤修、葉美珍 1999），隨後由台南縣政府文化局再度委託進行遺址範圍的調查探勘，確認遺址分布範圍面積廣大，文化層堆積深厚，具有重要之文化內涵（李坤修等 2002）。同一時期在東西向快速道路北門－玉井線環境影響評估過程中發現的西寮遺址，經評估為罕見於台灣的大型遺址（劉益昌等 1992），將受快速道路穿越影響，因此內政部邀集學者會勘，初步決定先行搶救工作，再指定為古蹟，由於道路建設經費延宕之故，因此本遺址遲至 2006 年才開始進行搶救發掘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在等待搶救工作期間，自然科學博物館同仁曾對此一遺址進行小規模試掘（劉克竑、李淑娟 2000），地方文史工作者亦經常性採集標本或進行室外教學，亦將此一遺址西側部分稱為過港貝塚（梁茂隆 2000）。

到了 2000 年之後，地方文史工作者許清保、許清長、周來春、曾順忠、何厚增、許懷哲、許懷美等人陸續進行台南縣周遭區域的遺址調查工作，除了原記錄調查發現的遺址外，本區域發現有白河·大埔、後壁·白沙屯等 60 處遺址，這些遺址分布於台南縣各鄉鎮，只有學甲鎮、將軍鄉、北門鄉尚未發現遺址，截至目前為止，遺址數量較先前記錄者明顯大幅增加（許清保 2004）。這些諸多數量遺址的發現，除了顯示研究區域應該蘊藏有不少史前遺址，只因長期未進行細緻的遺址調查計畫，致使早期發現之數量不多。除此之外，這些遺址出土相當豐富的文化遺物，涵蓋的範圍也相當廣泛，除了可以作為釐清台南縣史前文化層序探討的基礎資料外，對於研究遺址分布、聚落規模環境變遷等議題之探討，也提供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

此一階段台南地區的考古工作除了史前遺址的調查與搶救發掘之外，最重要的轉變在於開始進行歷史時期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首先是伴隨古建築整修而進行了億載金城的考古發掘（臧振華 1989）。從 1995 年開始的南科園區大規模發掘之中，也出土部分漢人墓葬、糖廍或舊社相關的歷史時期遺留（臧振華 2004，李匡悌 2004，臧振華等 2006），同時間也進行台南縣歸仁窯遺址的研究（黃翠梅等 2003、2007），不過歸仁窯址在此之前已經由民間文史工作者進行勘察與研究（鄭文彰等 2001）。二十一世紀初，在營造「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概念之下，台南市政府在中央政府補助之下，

結合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公共工程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基於已有的歷史文獻資料，整合建築學、土木學與考古學等領域，重新思索熱蘭遮城的學術與文化資產價值。此一計畫突破已往的做法，從考古學研究為出發點，主要目的在於試圖以考古工作的方法，翻閱原本已經過去，而且埋藏在地層中的人類活動資料，說明十七世紀的台灣與世界的關連，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點。考古田野的發掘工作包括探坑選擇、探坑發掘與記錄、坑位測量以及後續的探坑維護工作等，2003 與 2005 年先後進行兩次發掘，總計七個探坑，面積 238 平方公尺(傅朝卿等 2003, 李德河等 2005)。

在調查區域內的水堀頭遺址位於麻豆鎮素來有龍穴之稱的水堀頭地區，目前仍有一座立在地表以三合土築成的疑似港口遺跡，當地人對其功用有不同的說法，大致上有墓道說、碼頭說與水利相關設施等說法，為解決上述疑義，台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進行歷史學與考古學研究(林玉茹、劉益昌 2003, 劉益昌等 2005)。這個研究表面上似乎是單純針對地上物設施的功能，實際上則試圖從歷史考古學的角度，了解該結構與當地早期歷史的關係，可說是進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此一地點的發掘工作，同時在航道的地表下較深處發現了大湖文化層，出土罕見於大湖文化的青銅箭鏃(劉益昌等 2008)。

由於南科園區的發現，證實了學者早年研究指出蔦松文化是在地西拉雅族祖先的說法，更進一步在研究過程中開始思考，族群分類與史前文化的關連性，也得以指出人群更早的邊界，同時使學術界得以思考聚落、社會甚至更為深入的研究主題，不過這都不是原來環境影響評估以及搶救發掘之初所能設想。從十三行事件發生以來，學術界與政府所面臨的課題，終於在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修訂過程中完全顯現，從 2005 年開始，遺址成為文化資產的單一項目，但是卻沒有為台灣的考古學術界帶來相對的期許，反而是所有文化資產的重擔，開始落在學者的肩頭，台灣考古界的學術研究與文化資產，究竟如何界分，成為目前考古學界亟待思考的問題(劉益昌 2008)。

表 4：本計畫範圍戰後後期考古遺址調查研究史

年代	調查研究工作
1990~1992	劉益昌調查烏山頭遺址。
1992	11 月 17 日東西向快速道路北門—玉井段調查發現西寮、鳳梨山、內宵、玉井橋遺址。 11 月 18 日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規劃路線沿線文化遺址調查計畫調查鳳梨山遺址。 11 月 26 日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規劃路線沿線文化遺址調查計畫調查發現橋頭遺址。
1993	1 月 30 日、2 月 18-19 日、3 月 28 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大內遺址。

年代	調查研究工作
1993	<p>2月16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番子塢遺址。</p> <p>2月17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凹子腳遺址。</p> <p>3月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二重溪遺址、烏山頭水庫遺址、西寮遺址、橋頭遺址。</p> <p>3月14日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規劃路線沿線文化遺址調查計畫調查發現凹子腳遺址。</p> <p>3月25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白河水庫遺址、匏子園遺址。</p> <p>3月26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東原遺址。</p> <p>3月27、28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國母山遺址。</p> <p>4月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鳳梨山遺址。</p> <p>4月13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上茄苳遺址。</p> <p>6-7月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規劃路線沿線文化遺址調查計畫試掘烏山頭遺址。</p>
1994	3月27日臺閩地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調查隆田車站遺址。
1999	<p>4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火燒珠遺址。</p> <p>9月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二高工程承包商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由李坤修先生主持，執行烏山頭遺址搶救發掘。</p>
2000	<p>李榮宗發現木屐寮遺址（本計畫已將此遺址與白河水庫遺址合併）。</p> <p>3月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大松崎遺址。</p> <p>5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鹽水港遺址。</p> <p>6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菁埔寮遺址。</p>
2001	<p>5月許清保、何厚增調查發現開化遺址（本計畫已將此遺址與茅港尾遺址合併）。</p> <p>5月許清保、曾順忠調查發現水雉復育區遺址，中研院考古組臧振華、南科考古隊朱正宜、潘常武先生到現場會勘（本計畫已將此遺址更名為國母山Ⅱ遺址）。</p> <p>10月1日許清保、許仲甫調查發現六甲、中社遺址，文化局邀考古學者朱正宜、劉克竑、李匡悌會勘，台灣大學人類系學陳有貝先生探坑試掘。</p> <p>11月許清保、曾順忠調查發現拔子林遺址。</p> <p>11月5日劉益昌、顏廷仔調查發現太康遺址。</p> <p>11月30日許清保、曾順忠調查發現渡子頭（一）遺址、頭社遺址（本計畫更名為渡子頭Ⅰ遺址）。</p>
2002	<p>3月台南縣文化局委託，請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台南縣官田鄉烏山頭遺址範圍調查探勘計畫」，由李坤修主持，楊宗瑋協同研究。</p> <p>2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右武衛遺址、茅港尾遺址。</p> <p>6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小腳腿遺址。</p> <p>8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下營、上帝廟遺址。</p> <p>9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橋南遺址（本計畫列為二次堆積，不納入遺址表內）。</p> <p>9月21日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白河水庫壩頂遺址。</p> <p>10月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麻豆寮遺址。</p> <p>10月12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溫厝廊遺址。</p> <p>10月17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官田遺址（本計畫將遺址更名為官田村遺址）。</p> <p>11月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下營、大港遺址。</p> <p>11月許清保、許清長調查發現菜園港遺址（本計畫已將此遺址與老師園遺址合併為老師園遺址）。</p> <p>11月許清保、許清長、許懷哲調查發現老師園遺址。</p> <p>11月23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龜子港遺址。</p>

年代	調查研究工作
2002	<p>11 月 30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果毅後遺址。</p> <p>12 月 1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水漆林遺址。</p> <p>12 月 8 日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鹽水・土庫遺址。</p> <p>12 月 14 日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新營・過港遺址。</p> <p>12 月 15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東山・舊社遺址。</p> <p>12 月 29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番子田遺址（本計畫將遺址更名為番子田埤遺址）。</p> <p>12 月 31 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三結義（二）遺址（本計畫將遺址更名為三結義Ⅱ遺址）。</p>
2003	<p>1 月 1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三結義（一）遺址（本計畫將遺址更名為三結義Ⅰ遺址）。</p> <p>1 月 3 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南廊遺址。</p> <p>2 月 1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官田營區遺址。</p> <p>2 月 3 日許清保、許懷美、許懷哲調查發現渡子頭（二）遺址（本計畫將此遺址更名為渡子頭Ⅱ遺址）。</p> <p>3 月 16 日許清保、周春來調查發現五軍營遺址。</p> <p>3 月 18 日許清保及林姓友人調查發現牛稠埔 1 遺址（本計畫將此遺址與牛稠埔 2 遺址合併為牛稠埔Ⅰ遺址）。</p> <p>8 月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番子厝遺址。</p> <p>9 月 13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鹽水・番子寮遺址。</p> <p>10 月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後寮 1、白河・大埔遺址、西港・土庫遺址（本計畫將後寮 1 遺址、後寮 2 遺址合併為後寮遺址）。</p> <p>10 月 10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佳通橋遺址、佳龍橋遺址。</p> <p>10 月 11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港墘子遺址、鹽埕地遺址。</p>
2004	<p>1 月 10 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西勢尾遺址、許秀才遺址。</p> <p>4 月 1 日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坎子頭遺址。</p> <p>7 月 31 日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東山・木柵（三）遺址（本計畫將此遺址更名為東山・木柵Ⅲ遺址）。</p> <p>8 月 4 日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八老爺（一）遺址、八老爺（二）遺址（本計畫將八老爺（一）遺址、八老爺（二）遺址合併為八老爺遺址）。</p> <p>8 月 6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後寮（二）遺址（本計畫調查已將此遺址與後寮（一）遺址合併為後寮遺址）。</p> <p>8 月 8 日許清保、周來春調查發現菜寮遺址。</p> <p>10 月 26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新中營區遺址。</p> <p>11 月 13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外渡頭遺址。</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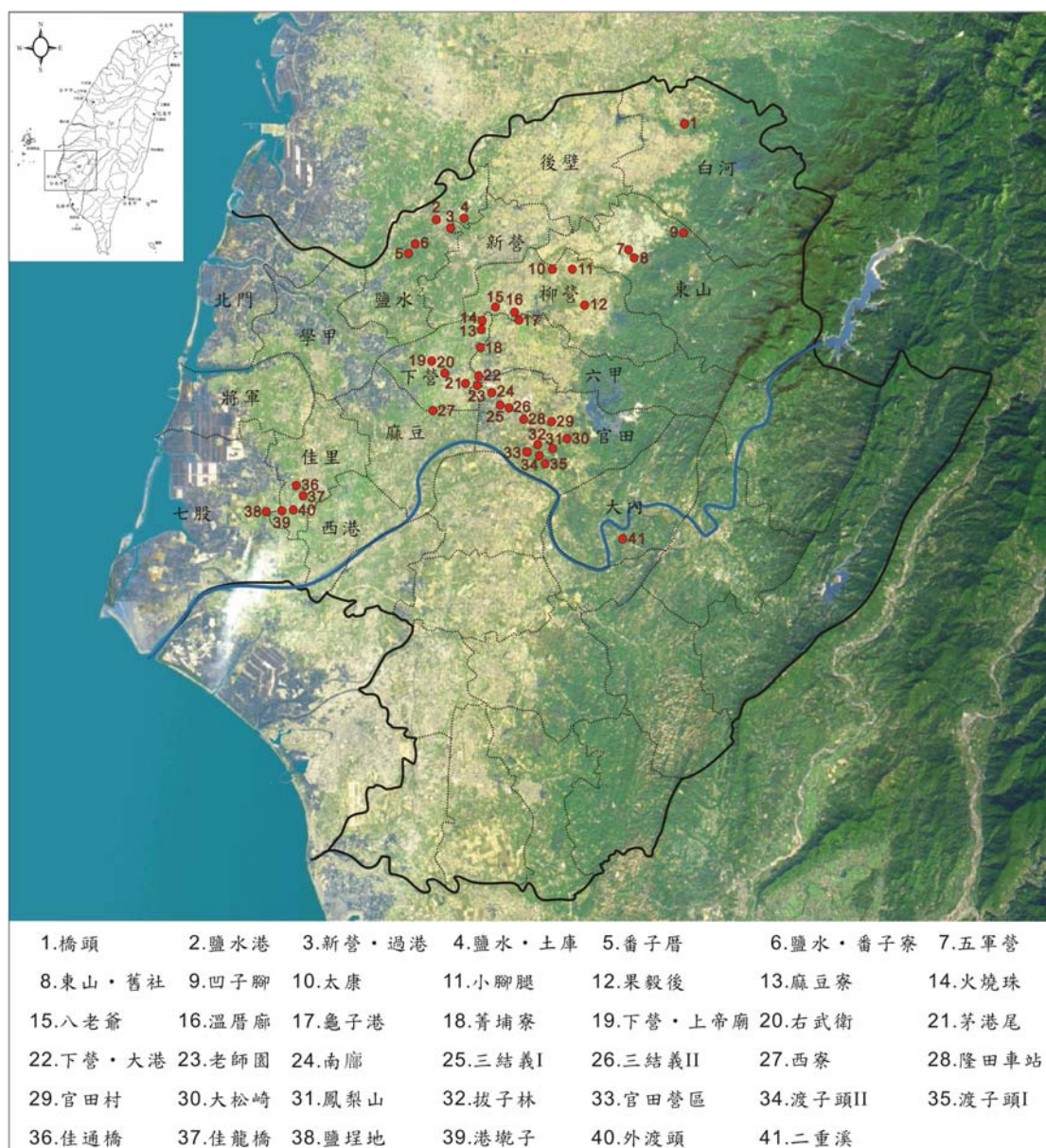


圖 6：本計畫調查範圍戰後後期發現之遺址（●表遺址位置）

（五）當代研究（2005-2008）

此一階段是文化資產保存法大幅度修訂實施以後的當代階段，由於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文化資產保存法與相關法令的鉅大修改，必然造成行政措施大幅度變更。民國 92 年公告的縣定古蹟「麻豆水堀頭古水道遺蹟」，依新修訂文資法規定，於 95 年 5 月 2 日審議變更指定為「麻豆水堀頭遺址」，同時也公告了南科園區內的道爺古墓遺址及道爺南糖廊遺址為縣定遺址，這三處遺址都屬於歷史時期遺址。2008 年 10 月 2 日台南縣遺址審議委員會通過，台南縣政府於民國 97 年 12 月 31 日核定南科園區內五處史前遺址為縣定遺址，

顯示出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後的積極意義。除前述南科園區與西寮遺址的搶救工作持續之外⁶，水堀頭遺址亦進行較大規模全面港域發掘（劉益昌等 2008）。台南縣境內可說是台灣地區同時進行考古發掘最多的地區，南科園區的發掘成果，亦進入博物館籌設及基金會成立的階段，顯示從環境影響評估、搶救發掘而來的成果，也擠入了學術研究的高峰。在此階段，考古學與遺址研究交織在文化資產搶救、處理以及學術研究的夾縫中，學界當重新評估考古學的研究工作何去何從（劉益昌 2008）。

延續日治時代末期以來，民間文史工作者或標本採集者的傳統所構成的地方文史工作者體系，在 1990 年代末期以來逐漸發酵成為另一個學術力量，本計畫的協同研究者許清保老師，從 1999 年以來開始調查台南縣境內的考古遺址，記錄並且採集標本，完成初步著作（許清保 2004、2007），同時參與教學參考資料之撰述（黃文博總編 2004）或學術調查研究（翁佳音、許清保 2004），突破以往標本採集者的限制，形成南瀛地區的在地研究體系。同時也繼續調查本計畫以及鄰近區域的考古遺址，持續記錄各遺址的保存狀況，在本計畫區域內紀錄多處新遺址。

表 5：本計畫範圍 2005 年以來考古遺址調查研究史

年代	調查研究工作
2005	<p>李榮宗發現岩前遺址。</p> <p>1 月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佳里、下營遺址。</p> <p>1 月 2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北頭洋遺址。</p> <p>1 月 23 日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佳中橋遺址。</p> <p>11 月許清保、許懷哲調查發現篤加遺址（本計畫重新調查並未發現，故暫不登錄為遺址）。</p>
2006	<p>2 月 6 日許清保、周春來調查發現臭祐 1 遺址、店子口遺址（本計畫將臭祐 1、2、3 合併為下秀祐遺址，店子口更名為新厝遺址）。</p> <p>2 月 25 日許清保、林先生調查發現番社 1 遺址、番社 2 遺址、番社 4 遺址（本計畫合併為番社遺址）。</p> <p>3 月 4 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東山·木柵 1 遺址、東山·木柵 2 遺址。</p> <p>3 月 18 日許清保、林先生調查發現北馬遺址。</p> <p>3 月 19 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牛稠埔 2 遺址。</p> <p>4 月 8 日許清保、周春來調查發現臭祐 2 遺址、番社 3 遺址（本計畫將臭祐 1、2、3 合併為下秀祐遺址）。</p> <p>4 月 15 日許清保、林先生調查發現後壁·烏樹林遺址。</p> <p>4 月 23 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安溪寮遺址（本計畫更名為下寮遺址）。</p> <p>4 月 30 日許清保、許懷美調查發現雙溪口 1 遺址、雙溪口 2 遺址、頂窩遺址（本計畫合併為頂窩遺址）。</p>

⁶ 西寮遺址為本計畫調查範圍內已知面積最大的遺址，也是目前已知發掘面積最大的遺址，仍持續進行發掘工作中，將於 2010 年 12 月完成整體發掘研究工作。

年代	調查研究工作
2007	<p>2月13日許清保調查發現後鎮II遺址（本計畫將後鎮I、II合併為後鎮遺址）。</p> <p>11月18日許清保發現白河・樣子坑遺址。</p> <p>12月1日許清保調查發現後鎮I遺址、後壁・白沙屯遺址（本計畫將後鎮I、II合併為後鎮遺址）。</p> <p>11月18日許清保發現白河・樣子坑遺址。</p> <p>12月1日許清保調查發現後壁・白沙屯遺址。</p> <p>12月29日許2007年11月18日許清保發現客庄內遺址。</p> <p>12月29日許清保調查岩前遺址。</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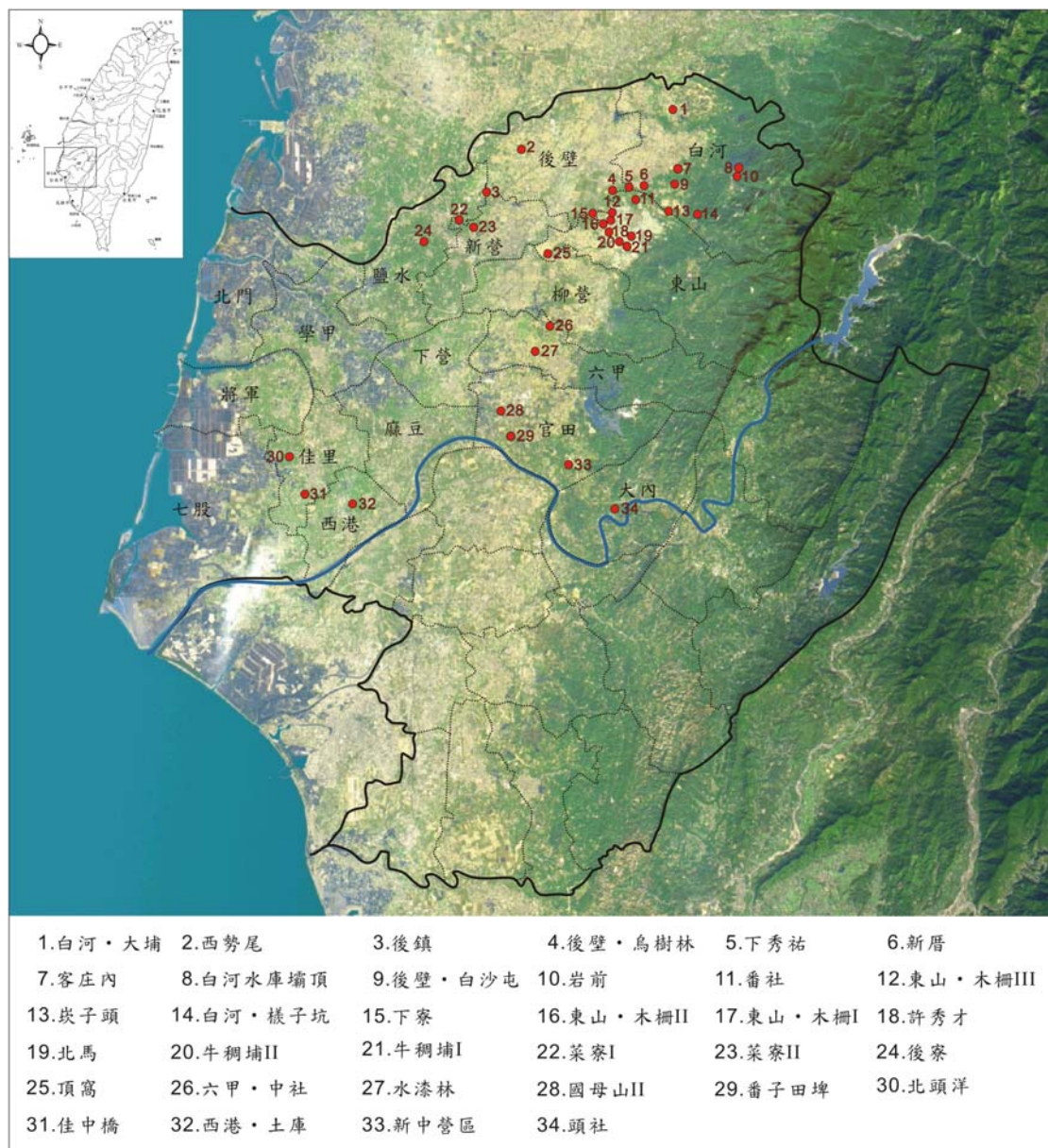


圖 7：本計畫調查範圍 2005 年以來發現之遺址（●表遺址位置）

二、年代與文化層序

西南平原地區雖然是台灣考古學研究中調查及研究較多的區域，但本計畫研究的曾文溪以北區域，實為台南縣境內研究較少的研究區域，南部有關史前文化層序的建立，也較少參考此一區域的研究成果。日治末期 1941 年國分直一先生根據陶器的型式，將西南部平原地區的遺址區分為四類，第一類以素面赤褐色和黑色陶為主，代表遺址為蔦松與湖內；第二類以多樣櫛目紋陶器為主，代表遺址為大湖、六甲頂；第三類以繩紋陶為主，代表遺址為牛稠子；第四類以具有櫛目紋、繩紋、籠目紋、素面等多種紋飾的陶器為主體，代表遺址為桃子園、鳳鼻頭（國分直一 1941：62），在這個階段國分先生僅根據紋飾的區分說明遺址類別，尚未及於其早晚關係。1943 年鹿野忠雄首先提出台灣的史前文化層序，他所提出的七個史前文化層序，屬於總體性的思考，只有黑陶文化層指出在西海岸南部地區最為常見（宋文薰譯 1955：100-117），由於戰爭的關係，鹿野忠雄有關史前文化層序研究並未持續。

戰後 1947-1948 年，國分先生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授課，講授「台灣先史時代概說」，曾根據台南台地上貝塚遺址的地理分布和台南附近海岸線變遷，推定分布在海拔 20 公尺左右的紅褐色繩蓆紋陶文化層最早，海拔 10-15 公尺左右的櫛目紋黑陶文化次之，再來為海拔 10 公尺左右紅褐色素面陶文化，最晚是海拔 7 公尺左右中國陶瓷器文化層（林朝棨 1960，國分直一 1962：65、1981：100-101，宋文薰 1965：146），首先將南部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化，並認為紅褐色素面陶文化層為史前時代最晚期的文化層。到了 1960 年，從事第四紀地質研究的林朝棨教授根據台南、高雄地區 31 個貝塚，說明貝塚出土的種類與貝群的特性，解釋貝塚形成與當時海水面的正負運動的關係，並指出貝塚當時海陸分布。在這篇文章中林教授認為 31 個貝塚，除了三崁店、台南郵局及內惟龍泉寺洞穴出土塗釉陶瓷，可能為新期貝塚之外，其餘均屬新石器時代同一時期文化（1960：75-76）。⁷

1965 年張光直、宋文薰主持的「台灣史前文化史研究計畫」，南部地區選擇高雄縣林園鄉鳳鼻頭遺址發掘，得到了堅強的層位及絕對年代學證據，發掘主持人之一的宋文薰教授認為：

根據地理分布的研究而得的國分氏台南台地史前文化層序，和根據鳳

⁷ 從目前的學術研究成果，已知這 28 個貝塚分別屬於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鳳鼻頭文化及蔦松文化等不同時期與不同性質的文化，因此這篇論述的結果可能需要重新檢討。

鼻頭遺址的層位學研究所得張、宋兩氏史前文化層序拿來相比，...國分氏的下層「繩蓆紋陶文化層」是與張、宋兩氏的最早一層「繩紋陶文化層」相結合。國分氏的中層「櫛目紋黑陶文化層」與張、宋兩氏的中層「龍山形成期文化層」的第二層「灰陶層」互相聯繫。國分氏的上層「赤褐色素面陶文化層」也是與張、宋兩氏的最後一層「素面含砂紅陶與灰陶所代表的文化層」互相對合的。(宋文薰 1965:146)

隨後張光直先生也在正式發掘報告中，根據鳳鼻頭遺址的層位將台灣西南部史前陶類分為粗繩紋陶 (coarse cord-marked ware)、磨研紅色細陶 (fine, burnished red ware)、紅砂灰砂陶 (sandy red-sandy gray wares group) 等三群，並列出相關的重要遺址 (Chang *et al* 1969:199)，其中最晚的紅砂灰砂陶群包括蔦松、六甲頂、三本木、六甲頂鹽行之間，芭蕉腳、鞍子、十三甲、牛稠子 (上層)、東門外、網寮、中洲、大湖、湖內、烏樹林、小岡山、桃子園、覆鼎金、左營、鳳鼻頭等遺址。從二位發掘人的說明，可知當時學界尚未將蔦松文化、大湖文化、鳳鼻頭文化清楚區分，仍籠統置於「紅砂—灰砂陶文化層」之內，對於這個階段的分類與瞭解，較戰後初期國分直一先生的分類似乎更不清楚。不過提出了清楚的絕對年代測定結果，使學界得以建立具有的年代學與層位學的文化體系。

黃士強教授從 1970 年代中期開始除了調查歸仁鄉八甲村八甲遺址，確認屬於大坵坑文化階段，同時利用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考古學田野方法」課程寒假實習，對牛稠子、大湖、大湖北 (大湖 II)、湖內、蔦松等不同階段的代表性遺址，所進行的一連串試掘工作，尤其是對於蔦松遺址，在民國 67、68、69 年連續三年進行試掘，共發掘 19 處探坑，得到各種遺物四萬餘件，以及清楚的層位資料 (黃台香 1982:1)，使學者們得以清楚認識這個遺址，進而重新檢討南部地區史前文化層序，認為以蔦松遺址為代表的遺址群，是台灣西南部地區史前時期最晚的一個階段，並稱為蔦松文化 (Sung 1979, 宋文薰 1980a、1980b, 宋文薰、連照美 1980, 黃士強 1980, 黃士強、劉益昌 1980)，其中黃士強、劉益昌首先將蔦松文化進行完整的描述，說明蔦松文化遺址分布以及文化特色 (1980:68-69)。此一階段可說是台灣與西南部地區史前文化層序完成的階段，不但具有層位學的證據，同時也有絕對年代學的資料，建立的大坵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蔦松文化四大階段直到目前仍為學界所遵循。

隨後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黃台香在黃士強教授指導下，

完整的將三次蔦松遺址的發掘結果呈現，並說明蔦松文化的地位、分期、蔦松與大湖文化、蔦松與海外菲律賓和蔦松與西拉雅族的關係（黃台香 1982），至此蔦松文化的地位可說完全確立，所缺少的只是絕對年代而已。1980 年代台灣考古界所使用的文化層序，都沿用蔦松文化，且視蔦松文化為一個同質性相當高的文化（劉益昌 1984，黃士強 1986，連照美、宋文薰 1986）。這些思考使得台灣考古界進一步認識南部地區史前文化體系，由於針對代表性遺址的研究逐步確立各史前文化階段的文化內涵，因此學術界開始進一步提出較為細緻的分類體系，首先在 1986 年由黃士強教授提出鳳鼻頭文化的概念，隨後劉益昌進一步建立以鳳鼻頭遺址上文化層為主的鳳鼻頭文化（劉益昌 1991），同時進一步區分蔦松文化的地方性類型（劉益昌 1994）。因此在 1994 年完成的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得以更進一步細緻化區分地方類型與時間期相，提出複雜的文化體系（臧振華等 1994），由於普查工作大部分以調查資料建立其分類體系，因此並未得到學界一致的認同，也沒有清楚的年代學或文化內涵指標。1998 年劉益昌根據歷年來蔦松文化研究資料指出蔦松文化時間與地方性類型的分期、分類構想，認為蔦松文化至少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在距今 1800-1400 年，其中鞍子類型主要分布於台南地區，清水岩類型主要分布於高雄地區，另外東原類型分布於台南縣東北部平原邊緣及丘陵地帶，至於高雄縣、台南縣南側之淺山丘陵地帶的美濃類型較早階段可能也屬於這個時期。中期年代距今 1400-800 年前，其中蔦松類型主要分布於台南地區，高雄平原地區未能區分出此一階段之文化類型，屏東平原及小琉球地區可能以下廊遺址為代表，至於高雄縣、台南縣南側之淺山丘陵地帶的美濃類型較晚階段可能也屬於這個時期。晚期年代距今 800-400 年，其中蔦松類型較晚階段主要分布於台南地區，高雄平原地區則以龍泉寺類型為代表，屏東平原及小琉球地區可能以小琉球之番子厝遺址為代表，至於高雄縣、台南縣南側之淺山丘陵地帶目前未能區分出此一階段之文化類型與遺址。蔦松文化之後大約在十六世紀中期左右開始，則為後世所知的平埔族群西拉雅等人群活躍的原住民為主體的時代。這些階段從金石並用時代，逐步轉變為使用鐵器為主的金屬器時代，最後在世界史的大發現時代，走入歷史時代初期以平原丘陵地帶原住民為主的時代（劉益昌 1998、2002、2007）。

近年來由於南科園區大規模全面性的發掘，得以建立園區內遺址一連串發展的文化內涵變遷與年代測定結果，首先提出十一期的分期概念，由早至晚為菓葉期、鎖港期、牛稠子期、大湖期、烏山頭期、魚寮期、鞍子期、蔦

松期、看西期、西拉雅期及近代漢人文化期（臧振華 2004），隨後提出的南科園區考古遺留文化層序則區分為六個文化及十一個分期，指出從早到晚為大坌坑文化（菓葉期）、牛稠子文化（鎖港期、牛稠子期）、大湖文化（大湖期、烏山頭期、魚寮期）、蔦松文化（鞍子期、蔦松期、看西期）、西拉雅文化族、明清漢人文化（臧振華等 2006）。這是目前所知最為詳細的區域文化分類體系，同時也都具有年代學與層位學證據，不過目前所知此一層序發展體系，並不完全適用於西南平原其他地區，未來仍有進一步提出其他區域文化層序發展的空間。就本計畫研究區域的資料而言，已可理解可能具有小區域的文化發展差異。

